



岭南文化书系
广府文化丛书

广府方言

詹伯慧 甘于恩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岭南文化书系
广府文化丛书

广府方言

詹伯慧 甘于恩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府方言/ 詹伯慧, 甘于恩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6
(岭南文化书系·广府文化丛书)
ISBN 978-7-5668-0147-0

I. ①广… II. ①詹…②甘… III. ①粤语—介绍—广州市
IV. ①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539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义雄
责任编辑: 潘雅琴 卜 颖
责任校对: 苏倩欣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135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38.00 元

(本书所涉个别图片, 如属个人版权, 见书后请函告出版社, 以便支付薄酬)

《岭南文化书系》编委会名单

主 任 林 雄

副主任 顾作义

主 编 饶芑子 蒋述卓

编 委 詹伯慧 林伦伦 林有能 刘启宇 倪 谦

黄 挺 李克和 左鹏军 宋俊华 谭元亨

吴永章 赖寄丹 韩中伟 徐义雄 史小军

岭南文化书系·前言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偏处一隅，岭南文化在秦汉以前基本上处于自我发展的阶段，秦汉以后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明清以至近代，域外文化不断传入，西学东渐，岭南已经成为传播和弘扬东西方文明的开路先锋，涌现出了如陈白沙、梁廷枏、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时代的佼佼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岭南再一次成为试验田和桥头堡，在全国独领风骚。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岭南文化形成了兼容、务实、开放、创新等诸多特征，为古老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和重构提供了多样态的个性元素和充沛的生命能量。就地域而言，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三大板块，而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为核心和主体。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总结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岭南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繁荣，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岭南文化书系》，该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化丛书》三大丛书共 30 种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尚无所不有，试图从地域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

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阐述对象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我们希望这 30 种图书能够成为介绍和宣传岭南文化的名片，为岭南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再次腾飞提供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曾获批为 2009 年度“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在项目申报和丛书编写过程中，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多次给予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学院以及暨南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岭南文化书系》编委会

2011 年 6 月 18 日

目 录



岭南文化书系·前言	(001)
一、绪 论	(001)
(一) 语言与文化的性质	(001)
(二)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003)
(三) 广府方言的文化底蕴	(006)
二、广府方言的分布、分片和来源	(010)
(一) 广府方言的分布	(010)
(二) 广府方言的分片	(011)
(三) 广府方言的来源	(015)
三、广州话的语音特点	(023)
(一) 广州话的声、韵、调系统	(023)
(二) 广州话语音的主要特点	(026)
(三) 广州话语音研究概述	(028)
四、广州话的词汇特点	(041)
(一) 广州话词汇的来源	(041)



- (二) 广州话构词方式的特色 (049)
- (三) 广州话词义的特点 (052)

五、广州话的语法特点 (055)

- (一) 构形上的特点 (055)
- (二) 词类中的一些特点 (058)
- (三) 语序上的特点 (067)

六、广府方言与传统文化 (074)

- (一) 广府方言与中古汉语 (074)
- (二) 广府方言与民俗传统 (075)

七、广府方言与区域文化 (086)

- (一) 自然地理环境在粤方言词语中的体现 (086)
- (二) 日常生活粤方言词语中的体现 (089)
- (三) 风土习俗与社会文化心态在粤方言词语中的体现
..... (096)
- (四) 广府方言与社区词 (100)

八、广府方言与外来文化 (104)

- (一) 广府方言中的外来音译词 (104)
- (二) 广府方言中的外来意译词 (110)
- (三) 广府方言中的直接借用外来词 (111)

九、广府方言的研究与应用 (113)

参考文献 (125)

后 记 (126)





一、绪 论

（一）语言与文化的性质

要说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还得从语言和文化的性质说起。

语言是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可笑。连小学生都会马上回答：语言不就是咱们嘴上说的话嘛！可这只是最直觉、最简单的认识。一旦深究下去，这嘴上说的话是什么性质？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功能？……这就难免要牵涉到许多理论上的问题了。语言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一门——语言学，正是因为我们要全面认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深入理解语言的方方面面，这的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从事语言工作的专业人士，长期以来不断地探索许多涉及语言的课题，可有不少问题迄今仍然存在着众说纷纭、各有各说的现象。这是由于语言跟我们人类，跟我们社会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人们凭直觉就能感觉到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跟社会始终联系在一块，因而也就习惯于从社会性方面切入来看待语言。语言的社会性也就自然成为大多数语言研究者的共识，也就是说，语言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不能没有语言。不过，语言也并非只是社会现象，语言本身也具有某些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因而，也有学者从物理学（声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语言的性质和语言的特点。这样，对语言的认识和研究，又不单纯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事，而难免要跨到自然科学的领域。面对这一实际，当今语言学家们大都认为人类的语言兼具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而语言学则是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范畴的一门学科。

文化是什么？历来都存有争议。20世纪中叶，正当有关文化的概念被争论不休之际，便有西方人做过统计，发现社会上给“文化”所



下的不同定义竟达 100 多种，足见人们对“文化”的内涵和属性的认识何等悬殊！真可谓千差万别，众说纷纭。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人们总爱把文化归入和“物质”范畴相对的“精神”范畴来理解。在“既抓物质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的“两手抓”中，凡属被看作是“文化”的东西，大都被归入“精神”的范畴中来。这种把“文化”归入“精神”领域的看法，只能说是对“文化”的狭义理解，唯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提法，才能真正囊括“文化”的所有内涵，才是一般人理解的所谓广义的文化。这种广义的理解比较切合实际。学术界在论及文化学的时候，往往涉及社会学和人类学，界定“文化”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比较大，总是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当前这个从广义上来理解“文化”的观点已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主编的《文化语言学》，就是赞同这种包罗万象的广义“文化”概念的，广泛到把“文化”看成是人类的一切所作所为。该书明白地宣称：“本书赞同广义文化定义，把文化看作是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而共同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而形成的心理和行为。”为确立这样一种广义的文化理念，《文化语言学》还认同国外学者的下列阐述：“文化从广义上讲，就是人类创造的结果的总和”（前苏联·萨哈罗夫）；“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美·克鲁柯亨）。在认同文化应是广义的、包罗万象的前提下，文化实际上可有三个不同的类型：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心理文化。其中二、三两类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精神文化”。话虽如此，对于文化这个术语，我们总是在笼笼统统、模模糊糊的状态下来使用它，而不去认真考究其内涵到底是宽的还是窄的。说一个人文化程度多高多低，这个“文化”显然有具体的内容，不会是指广义的文化；当我们说“中华文化”、“华夏文化”时，自然是指广义文化；当人们论及“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时，显然是指广义文化中某个具体范围内的文化。我们现在大力开展文化交流，范围可大可小，但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着重于“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例如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前面我们阐述了语言和文化的性质，基于上述对语言和文化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经常相依相伴的概念串到一块儿来，剖析一下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府方言这一特定的语言与粤语文化这一特定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它的交际功能，即它是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人们归纳语言及其书面形式——文字的作用时，总是认为语言文字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文化性。就传递信息这方面来说，范围和内容也是可大可小、可多可少的。少可以少到只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今天晴天”、“他来了”之类；多可以多到记录社会上发生过的许许多多重大事件。我们常说我们的国家是具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我们把一些通过我们古老的语言及其书面形式记录、承载下来的历史文献视为华夏文化的瑰宝，正是有了这些源远流长、充满活力的语言文字，中华民族深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才得以承传下来、弘扬开去。语言是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有它的先天性；而文化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可以说，文化并无先天性可言。前面提到“文化是人类创造结果的总和”，正是这个意思。重要的是：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文化，都必然要有一定的符号系统来记录它、承载它，而语言文字，正以其最典型的形式表现出不同人类群体所拥有的不同文化和不同的文化活动。说到底，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文化要通过语言来表现，这就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关键所在。甚至可以说，语言文字是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不是有的民族迄今尚无自己的文字，也就是缺乏本民族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吗？那就只好通过口头语言来承载、来表现该民族的优秀文化了。通常我们所说的“口头文学”，正是这种有语无文情况的体现。

众所周知，不同的文化被视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乃至不同地域的特征的集中体现。从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地缘出发，人们往往会提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类带“东”、“西”这样的地理方位的词语来概括具有不同特征的不同文化；而针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又会提出诸如“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当代文化”



这类带时间性的词语来概括。重要的是：无论哪种文化，总是要通过其载体——语言及其书面形式文字来表现，这就决定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始终是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的。而不同的语言文字，其内涵也总要反映出不同的文化。

语言承载文化，但并非只是客观地记录文化。在记录文化的过程中，语言还有可能会影响文化。而文化呢？它需要语言来记录、来承载，但也不只是被动地让语言来记录它、承载它。因此，我们在看待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还应该看到语言与文化存在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双向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考察和认识，使我们有可能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常常表现为一种“互限”，这种“互限”在人们的社会语言生活中时有所见。拿语言影响文化来说，在我们的汉语中就有不少例子。例如汉语中有一些同音词的应用，就往往会影响到某些特殊生活习俗、文化心态的形成和发展。“人生自古伤离别”，由于作为水果的“梨”和离别的“离”同音，就致使有的地方在某种和睦欢聚的场合，人们不大愿意以“梨”饗客，甚至忌讳把梨切开来吃；同样的心态，由于“苹果”的“苹”与“平安”的“平”同音，人们在上医院探视病人时，送上的水果总是首选“苹果”，可是在吴语地区“苹果”又与“病故”谐音，所以当地探望病人时不选苹果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当今语言的社会应用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之所以经常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拥有一个能为大家共同掌握、共同使用的社会通用语，其中最重要的理据就在于共同的语言势必带来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凝聚力。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共同使用同一种民族共同语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赋予该共同语以独特的文化特征，使之能够很好地适应于本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形成的风情习俗和心理状态。在使用共同语的过程中，共同语往往会约束、影响着使用它的成员，使之具有共同维系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和归宿感，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促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可见语言文字对于独特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另一方面，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更是随处可见。每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一些反映文化因素的语言新现



象，这在词汇的发展中尤为常见。例如，在我们丰富多彩的汉语词库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增添一些反映该时期文化走向的词语。中古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东传，汉语就明显出现了一些有关佛教文化的词语；近代，随着海禁大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日渐增强，大批反映域外文化的外来词语又蜂拥而来，使现代汉语词汇中出现了一批反映外来文化的新词语。地处沿海的汉语粤方言，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因为语言和文化交织在一起，多年来我们在广招域外学生学习汉语，“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的情况下，为了使对外汉语教学日趋完美，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我们总是特别强调非把汉语的学习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掌握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实践证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只有当他们对中华文化制约、影响汉语的问题有深刻认识时，才能够融文化知识的传播和语言规律的教学于一炉，取得良好的效果。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既影响到语言体系的形成，也影响到语言中各个要素——语音、词汇、语法的表现。拿我们今天通行全国的汉民族共同语来说，它的基础方言之所以是北方方言，它的标准语音之所以是北京语音，绝不是偶然的事。只要回顾一下汉民族共同语及其标准音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历史文化的条件始终是影响汉民族共同语及其标准音从萌芽到成熟再到定型的重要因素。从春秋时期出现的初步具有共同语性质的“雅言”，到经历四百年南北分裂、“正音”一时无所适从，再到隋唐以后以至宋元明清，民族共同语始终是沿着既定的轨道向前发展的。这个轨道就是：每一个历史阶段，共同语都是在作为华夏文化发源地的北方方言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从公元1153年以后的八百年间，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话在全国的影响经久不衰，北京语音也就逐步奠定了其成为共同语标准音的地位。经历了几千年的不断发展，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很快就确立了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民族共同语作为全国通行的普通话，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迅速普及，最终取得显著的效果。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因素在确立和推广汉民族共同语，特别是在推行汉语标准音——北京音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再从语言中词汇、语法的应用方面来看，文化影响的影子更是常



有所见的。众所周知，我们的汉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中的语序问题。在比较不同语言间语序的差异时，往往就夹杂有文化心理上的因素。拿时间的表述来说，我们习惯于从年到月到日，这跟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大到小”的观念不无关系。我们不是常说，“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吗？这正是一种从大到小的心态。西方人的观念却跟我们不同。他们的时间排序一般按“日一月一年”排列，这也许又是另外一种从小到大的文化心理的反映。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真可谓无处不在。语言的使用者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经历、修养、性格等，这些反映不同文化素养、不同社会心态的因素，时刻制约、影响着语言的运用。同一个意思的表达，从不同人（或人群）的嘴里说出来，所用的语言，包括内容和形式都可以有相当大的差别。人们往往可以从中揣度说话者是什么类型的人：文化程度高的人还是缺少文化修养的人，是城市人还是广大农民兄弟。毫无疑问，言语形式的选择应用，多少能够透露出说话者的职业和地位，甚至多少可以看到其脾气的好坏和性格的类型。因为正是每个言语使用者的社会文化特征时刻左右着他在言语交际中对语言的选择。此外，长期积淀形成的思想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制度、宗法制度等与人们的社会心态、价值取向关系至大，这些也都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语言应用的文化因素。拿我国来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下，以儒家思想为主宰而形成的一整套忠孝仁爱道德礼教，几千年来深入人心，必然都会直接影响到语言的应用，譬如汉语及其方言中一些所谓避讳语、敬语和谦语的出现，都是这类基于儒家思想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的反映。

以上略述语言与文化的一些关系。语言是发展的，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语言与文化间的关系日益多样化，我们必须不断跟进语言与文化的发展，从动态中来认识和剖析语言与文化及其日益多样化的关系。

（三）广府方言的文化底蕴

前面我们剖析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笼统地论及了中华传统文化与汉语之间的关系。既然语言是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源远流长的汉语承载着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那么，作为华夏文化一部分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种地域文化，自然也就应该主要通过汉语的

各种地方变体——地方方言来承载了。像粤语这样历来通行范围较广、使用人口较多、在汉语诸方言中一直处于“强势方言”地位的岭南方言，它理所当然的是广大粤语地区的文化——通常称之为广府文化的承载者了。换言之，历来人们要认识广府文化，要研究广府文化，就非通过广府方言即本书所说的粤方言这道“桥”不可，只有通过粤方言这一载体，我们才有可能顺利看清广府文化的真实情景，广府文化多彩多姿的面貌才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粤方言承载的广府文化，最突出的表现莫如以粤方言为载体的众多文学艺术作品了。就拿粤方言地区民众喜闻乐见的粤剧粤曲来说，从创作到演唱，可以说都离不开对粤方言的依赖和掌握。不能想象，一个对粤方言一无所知的作者能够创作出精彩的粤剧粤曲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位不熟谙粤方言的演员能够把粤剧粤曲演唱好和表演好。地方戏曲创作水平的高低和演唱水平的高低，当然要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而能否熟悉、掌握承载该戏曲的语言特色，特别是它的音韵特点，无疑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毋庸置疑，在粤剧粤曲的创作和演唱中，总是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把粤方言的音韵规律、音韵特点融合进来。在这一点上，研究粤方言的专家和粤剧粤曲的创作者、演唱者如有机会通力合作，自然就会取得最佳的效果。就研究和实践的结合而言，在我们盘点粤方言研究的丰硕成果时，就发现过一些令人鼓舞的现象。让粤语音韵的研究和粤剧的创作、演唱挂起钩来，通过粤语学者和粤剧专家的共同切磋而完成的某些课题项目，其成果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方言研究与方言应用密切结合的良好范例。据我们了解，21世纪初，暨南大学方言学科的博士研究生陈志清就以他的题为《粤曲音韵研究》的博士论文获授博士学位。这篇论文详尽剖析了粤曲的声韵内涵及其“粤味”特色，着力阐明对粤语音韵的认识和掌握在粤曲创作与演奏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许



粤剧专业期刊《南国红豆》



多以粤语研究为专业的学者，立足于粤语与粤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粤方言承载粤语文化这一基本理论出发，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对南国家喻户晓的粤曲如何依仗其独特的粤语音韵以实现其成为一种深受粤语区域人们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2007年创刊的以刊登粤方言研究成果为主旨的期刊《粤语研究》，近期也刊登过几篇这方面的论文，让读者不无耳目一新之感。例如香港理工大学著名的粤语专家张群显教授就与香港演艺学院的王胜焜先生合作，在《粤语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把粤音研究和粤曲研究结合起来的长篇论文《粤曲梆黄说唱字调乐调配合初探》。上面提到的博士论文《粤曲音韵研究》的作者陈志清也在该刊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了论文《粤语填词及文字谱制定刍议》。由此可见，单就粤曲粤剧这一“广府方言”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艺术而言，粤方言不仅是它们理所当然的载体，而且在粤曲粤剧的深入探讨和大力弘扬方面，也少不了粤方言研究的配合。仅此一端，粤方言与广府文化的紧密关系也就昭然若揭了。

正因为文化始终离不开它最为重要的载体——语言，广府文化与广府语言（粤方言）的关系，随着现当代广府文化的不断创新发展，特别是广府文化辐射能力的不断扩大和广府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广府方言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传播四方，以至深入人心了。当年我们广府地区的祖先带着浓浓的土音土词漂洋过海，富于辐射力的广府文化就连同其载体广府方言洒落到五湖四海，形成了许许多多侨居地的“白话社区”；而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插上经济腾飞的翅膀，当“敢为天下先”的广府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时，伴随着“广货”蜂拥北上，广府文化又搭上了顺风车，像当年漂洋过海那样，飘向了大江南北的广阔大地。不是有一篇文章提出“普通话南下，粤方言北上”的说法吗？文章作者丝毫没有要让粤语——广府话跟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抗衡的意思，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始终只能有一种足以维系14亿炎黄子孙的共同语，我们始终得维护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主流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主流必有支流，有主体文化也必有地域文化。依附于地域文化的地域方言，必然也会随着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扩散到本地域以外的地方去。所谓“粤语北上”，可说是粤语文化北上的副产品。今天的广府文化，

作为深具特色的“非物质”、“广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流入广府以外的神州大地，也就不足为怪了。君不见一曲“霍元甲”风靡全国之际，这一以粤语承载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通俗歌曲，就连同歌词中粤方言的音韵词汇，一股脑儿地传播开来了。所谓“粤方言北上”，指的



刊登粤语文化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
《粤语研究》

也只是这类粤音粤词的“北上”，包括已渗入民族共同语中来的许多粤味新词罢了。绝不可能是整个粤语的“北上”，更不可能导致北上的粤语要跟普通话“平起平坐”。

由此看来，广府文化离不开广府方言，而广府方言又总是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广府文化，这就是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关系的真实写照。

